

個人體驗與參與的歷史

—— 一個中國人的「福澤諭吉情結」

◎ 臧一冰

有時候我們觀察思考歷史，不期然也悄悄地走了進去，成了新的歷史細節。

——作者

十幾年前，那是剛進大學，第一次讀福澤諭吉。

那時候，商務印書館開始出版那套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哲學類的都是橘黃色的封底，白色的封面。當時，在書店看到那種顏色的書，心中的興奮是很難形容的。記得那一次買了兩本，一本是中江兆民的《一年有半續一年有半》，另一本就是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略》了。當時背景是，中日青年大交流，中日還合辦了一個大型刊物叫《日本》，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都為該刊物題了刊名。那是一本全面介紹日本的雜誌，圖文並茂彩色銅版紙，印刷質量也很好，內容特別精到，價格只賣一元錢，但只可惜出版了兩期就停刊了。原因就是胡下臺了，胡當時把中國青年的目光引向日本，特別是讓大批的中日青年在一起交流，大概希望中國青年一代能感染上日本人的國民精神，他的用心可謂良苦。記得當時，我在武漢新華體育館見到胡在主席臺上的樣子，一點點官架子也沒有，小小的個子，風風火火，講話很有激情，他的茶杯的水完了，就站起來招呼服務員為他加水。那時後，我一點也不理解胡，只覺得一國之主，似乎應該穩重一點。後來知道了胡的許多事情，每次想起胡在主席臺上的樣子，心中就有說不清是一種甚麼情感，為胡？還是為我們這個國家？

當年我們一幫愛好哲學的同學，有人先買回了《文明論概略》，差不多是呈奔相走告狀。那個時段，大家先後不同的時間讀它，討論起來特別興奮，先看的人能吐先睹之快，後面的人就更怕有讀書的慾望了。後來我做了教師，中學、中專、大學，都教過，只要有適當的機會我都禁不住會向學生講日本、講福澤諭吉，講他的《文明論概略》，僅僅我所知道的那一點，有時講起來甚至會濕潤自己的眼眶。

事情就是這麼湊巧，前幾日在中文大學崇基圖書館，看到呂理州先生寫的《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傳》，打開書，前言中居然這樣寫到：

有這麼一則軼聞。

一九一四年日軍擊敗德軍，佔領青島。當時，日本的守備軍司令官叫做神尾光臣。某日，神

尾在其巡視地方的途中，參觀了一間鄉間小學堂。

那間學堂的中國教師請神尾向學生們隨意問幾個問題。

神尾便問道：「你們覺得中國現在誰最偉大？」

學生們異口同聲地回答道「孫逸仙！」

神尾又問第二個問題說：「那麼日本呢？」

學生們回答說：「福澤諭吉！」

神尾吃了一驚，因為他原先期待的答案不外是明治天皇或伊藤博文，沒想到這些中國學童的回答竟是福澤諭吉。（呂理州1993：13）

除了青島的那位老師和我，我相信中國一定還有其他的老師向他們的學生講過福澤，為甚麼一百年來，會有中國的老師有「福澤情結」呢？日幣一萬圓紙鈔上的那個福澤諭吉，為甚麼令一些中國人如此地入心呢？



現在日本一萬元現鈔上的人像即是福澤諭吉

有日本的伏爾泰之稱的福澤諭吉（1835—1901），是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¹認為是他締造了日本的現代文明，也不過分，當然，日本有很多事情不是福澤做的，但是縱觀日本近現代歷史，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福澤確實做了相當關鍵的事情，而且他把這件重要的事情做的徹底、完整。

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同樣是面對西洋的文明，福澤做法跟中國卻不一樣。他早期化了數年時間的遊歷西洋，寫出《西洋事情》，詳細地介紹西方，他是將西洋的事情原原本本的介紹給自己的國人，不僅講西方的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更講西方人的具體的生活方式，他講述西洋文明的細節之到位，以致後來一位日本人到西方，在寫給父親的中說，某些事情就是福澤先生書中說的那樣，我就不多說了。福澤學習西方，也是從輸入觀念開始，但是，福澤輸入觀念則力求從完整開始，而不是零碎的拿來一些「主義」，輸入觀念的方法也是很特別的，不是像我國當時的某些知識份子那樣先怒罵自己的傳統，然後狂熱膜拜別人的一切。福澤是以一種靜靜的理性和關懷面對普通民眾理解力，讓老百姓知道那些他們應該知道的事情，把西洋文明發展的原理深入淺出地、很家常地講述，力圖說服每一個普通國民，有這樣一種誠摯的情感驅動，所以福澤的書才會有那麼多人去讀，自然，西洋文明的傳播也就十分廣泛，而且儘量不是支離破碎或斷章取義。你想福澤把一種好的生活方式娓娓的介紹給日本的鄉親，大家怎麼會不領他的情呢？福澤介紹西洋的文明，一直是一種很樸實的信念，那就是一定要讓日本的國民從根本上明白西洋的文明是怎麼一會事，他力求把社會生活所涉及的

各種道理明明白白的向國民說透徹，說得清的說不清的他都不躲閃，心平氣和。他舉日本的例子、舉中國的例子、舉西洋的例子放在一起比較，啟發大家，真可謂苦口婆心。在我看來日本人學西洋時，心比較安靜，而我們中國則比較急躁，兩國的這些特點一直到現在還保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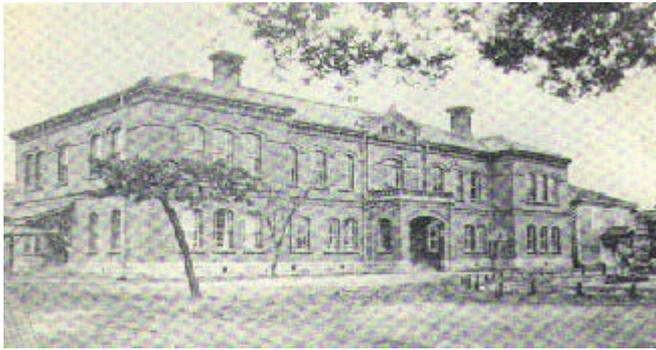
西洋文明強大起來以後，許多殖民地人民都受到洋人的欺侮，1860年福澤途徑香港，在「奧琴號」上向一個中國人買鞋，二人正在談價，不想，過來一個英國人，二話不說，搶過中國人手中的鞋，塞給福澤，又從福澤那要了兩塊錢，揮杖把中國人趕下了船。福澤對這件事印象極深。以致22年後，提及此事，他寫到：

這些西洋人在東洋諸國橫行霸道，如入無人之地，與過去的幕吏在國內橫行相比，威勢更勝一籌。當時，我心中自然很不愉快，禁不住產生一種血氣獸心的想法，希望有朝一日，我帝國日本也能做幾億萬元的貿易，擁有幾千艘的軍艦，讓日本的國旗飄揚在中國、印度的海面出入西洋諸港，大大地光耀國威。而且像英國人壓制中國人一樣更要壓倒英國人，捆綁其四肢像奴隸般對待。（呂理州1993：80）

我們暫且不論福澤的這些想法後來是如何的影響了日本的國策和亞洲人的命運。但由此可見，福澤當時強國之心不為不切。然而福澤的做法卻極為冷靜，因為他看到了事物「背後的背後」的原因：軍事強大的背後是國力，國力的背後是經濟和科學技術，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背後是國民素質，國民素質的背後是教育，真正的教育的背後是學術自由，因為只有學術自由才是產生和聚集大量國民智能的唯一辦法。因此福澤幾次遊歷歐美都是帶回了大量的歐美的圖書，並著手翻譯介紹，後來又開辦了慶應義塾。再加上不像中國，知識份子一輩子被科舉和職稱考試牽著鼻子走，即便是在封閉鎖國的時代，日本的知識界也相當多元化，有學國學的、有學漢學的、有學蘭學的，日本的這種社會背景使得福澤潛心辦學著書成為可能，這些大家都知道。慶應時期的幕府和明治時期的新政府都曾軟硬兼施的要福澤出來做官，都被福澤拒絕了。他一方面辦學，一方面著書，在他看來啟發民智之後，民眾才會有正確的行動能力，民眾有智慧才能理解個人存在的意義以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而僅僅訓練人獲得某種技能，人成了社會運轉的一個工具，所以健康穩定的國家就不容易建立起來，因為這個社會的主要成份是沒有獨立頭腦的工具構成。中國的知識分子知道這個簡單的道理的人非常多，但是徹底去實踐的人卻極少，即使實踐也多半途而廢。福澤卻幾十年一直堅持辦學培養人才（而不只是人材）和著書，循循善誘地啟發國民，直到日本社會理解了他所倡導的東西，他才有節制地涉足政治。

鴉片戰爭以前日本人一直很仰慕中國，有些日本知識份子到了長崎，還會因為地理位置離中國較近而沾沾自喜。可是鴉片戰爭以後，他們開始修正對世界和對中國的看法。福澤改變對中國的看法是1862年在倫敦，有一個中國人問福澤，現在日本國內能夠讀洋書的有多少人？福澤當時說具體我數字不知道，但估計有500人，然後，福澤反問：中國有多少？那個中國人想了想，紅著臉說有11人，福澤當時感到這個儒家思想的發源國沒有甚么指望了。（呂理州1993：63）雖然福澤當時並非完全瞭解中國，但是當時的日本知識界認為中國盲目自大卻是不錯的。鴉片戰爭中國失去了大國的尊嚴之後，希望洗雪民族恥辱的強國之心一直是很強烈的，很急切的，但也正是因為這樣，冷靜下來客觀地分析自己不夠，但有分析，多是偏激的情緒，像五四；但有行動，大多也是急功近利。因為說到福澤辦教育，我們還是拿教育來說，其實與福澤同時代的中國人中，也有一個同福澤一樣希望以教育救國的人，這個人是張之洞。

但從做事的氣派來說，張之洞比福澤要大，福澤1868年辦慶應義塾，規模很有限。張之洞1866年出任湖北學政。1869年創辦經心書院，次年創辦兩湖書院等，此後的幾十年中，張之洞立足湖北大興教育、大辦學堂僅在武昌就開辦各種學堂就有三十多所，當時湖北全省的教育水平更是全國的楷模，而且影響了全國。（董寶良1996）



左圖為明治20年建立的慶應義塾禮堂及演說館。資料來源：福澤諭吉著《福澤諭吉教育論著選》王桂主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比較現在的中日兩國，一個是發達國家，一個是發展中國家，但是，再看19世紀末，實際距離沒有那麼大。從教育來看，1900年日本實施全部免費義務教育，而在此之前，日本雖然頒佈了義務教育法由於未實施免費教育，普及教育發展緩慢。張之洞、端方等人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發佈的《鄂省普及學塾章程並示》中專門聲明：「此學塾皆官費，不收百姓分文」1904年張之洞等人的《學務要綱》、《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中也強調「初等小學堂及優等師範學堂均不收學費」、「官設初等小學堂永不令學生補帖學費，以便平民，庶可其教育之廣及」（舒新成1961：215）而實際上，張之洞運用庚子賠款和其他捐收保證經費來源。（董寶良1996：217-218）其實清末社會，民生凋零，危機四伏 經濟處崩潰邊緣，中央國庫虧空、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籌集教育經費可以說非常困難，張之洞能如此作為，可見他對教育興國認識之深刻。一百年過去了，中國的歷屆政府沒有誰不認為教育不重要，但是到目前，中國大陸的義務教育仍然是收費教育，有些地方甚至長期拖欠教師工資，想起張之洞，現在好像也沒有甚么話可講了，耳邊只想起印度一句諺語：想做一件事，會找一個方法，不想做一件事，會找一個藉口。



左圖上為福澤諭吉於1899年除夕迎接新世紀寫的「獨立自尊迎新世紀」條幅，也是他的絕筆；下圖為福澤諭吉與他的學生散步。資料來源：呂理州：《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則諭吉傳》[臺北：源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3]

比較福澤諭吉和張之洞，是很有意思的研究，也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但是我們也可以簡單的比較一下：兩人都充分意識到教育對於強國的重大意義，兩人都寫有《勸學篇》，但是勸學

的心態不同就勸出了兩種結果。福澤諭吉的勸學是勸國民大眾之學，希望民眾真正懂得人的權利和尊嚴。而張之洞的勸學主要是官僚政客之學，希望他們改變觀念去拯救國民。他們兩人為辦學都是不遺餘力，但是著眼點不同，產生的影響也不同。福澤強調國民觀念的啟蒙，重在引進西方強國的觀念實質，也就是對大千世界的根本認識，以及這些認識所產生出的新的文明成果。可謂知其然，亦窮其所以然。而張之洞也分析到西方強大是人材的因素，人材是學校培養出來的，所以要大力辦學培養人材，至於人材是如何培養出來的，在這個問題上就只停留在技術層面上，認為辦學主要是儘快培養實用的技術人材，並希望這些技術人材振興實業，很快使國力強大起來，就是大家知道的「中體西用」。說到底還是一種急躁的實用思想。關於他的人生觀、哲學觀與思想行為長期擔任其幕僚的辜鴻銘曾說：

余謂文襄之學本乎荀子也，蓋為其物外自高，故未脫于功利之念也。（董保良1996：54）

在現代，日本人將西洋的東西，自己傳統的東西，學洋人學古人創造的新東西這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中國人把這三樣混合起來，有說是被「漢化」了，往高處說是被「天人合一」了。到底該如何評論呢？眾多的問題，在這樣一個敘事的文本中不方便展開討論。只能就事論事的發幾句怨言了。

現在看來，就算「中體西用」有自己的道理，事實上應該首先把人家的東西弄個清楚，然後也用個明白。這算是同福澤諭吉相比較，我們對張之洞的苛刻要求。可以說，一百多年來，中國大眾對西洋文明的認識，基本上還停留在張之洞的認識水平上，沒有從根本上超越他。

中國人可以不同意「全盤西化」，因為我們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我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必須根據我們的實際要求來建立，我們自己生存之快樂也必須是從自己的內心中生發出來，我們不需要從外表上模仿別人的快樂。但是，當現實讓我們產生了學習別人的願望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先靜下來，全面、系統地瞭解別人的情況，然後準確地告訴自己的廣大國民（而不只是部分精英）這些完整的知識，以此正增長社會公眾的整體見識，讓大眾消理解、學到的別人純正的東西，就像福澤諭吉先生做的那樣。但是，學習別人的文明，也要心平氣和，不能上來抱著批判的情緒是不容易學好的，特別先要有尊崇的心理，認為那也是別人對於人類的貢獻，而我們現在去享用，要心存必要的感激之心，這樣才可能談得上學習、理解、運用和最後補充完善它。應該心存一種善意的全球化意識，也不要像福澤諭吉先生那樣，懷著一種復仇的心態去學習，結果國力雖然增強了，卻給自己的民族以及周邊的國家都帶來了災難，從世界範圍來看用煽動民族主義的賭氣的方法來尋求發展的動力，固然可以刺激國民的鬥志，但是，它的結果常常是引火焚身，更何況本國的人民在創造文明的整個過程中，也體驗不到創造文明的健康的心情，于文明創造和傳播的宗旨也相悖。對於整個人類來說，同樣是悲劇。因此，各國情緒對立的國力競爭，也無疑是大家共同完蛋的開始，這樣的惡果大家都看到了。

歷史上的政治家們的高度自信差不多都表現在自認為他們擁有了必要的真理和美德，只不過是總有人搗亂而使他們無法實施而已，但是一旦局部的衝突發生，他們又從來都是首先拋棄人類最基本的善的原則，去賭他們的輸贏，去用無辜的生命換回他們權利和尊嚴。沒有誰能教育政治家，就算他們天生有善根，也不保險。哪怕是像福澤諭吉這樣的人，一旦介入政治晚年也會那樣。

最後，為了為以上沒有甚麼理論背景的「私人話語」尋求到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也為了與本文開頭的標題呼應起來，我不得不把魯濱孫(James Harvey Rubinson)的一段話引在最後：他在《新史學》的第一章中說「從廣義來說，一切關於人類在世界上出現以來所做的，或所

想到的事業與痕跡，都包含在歷史的範圍內。大到可以描述一個民族的興亡，小到描寫一個平凡人物的習慣和感情。」（魯濱遜1964：3）最後一句正好適合這篇小文。

參考文獻

- 董寶良：《從湖北看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 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 福澤諭吉著、群力譯：《勸學篇》（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 呂理州：《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傳》（臺北：源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3）
-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 丸山真男：《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 張之洞：《勸學篇》（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魯濱孫（Robinson, James Harvey）著、齊思和等譯：《新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註釋

- 1 呂理州著作的書名為《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傳》。1993年臺灣源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臧一冰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博士生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九期 2003年10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九期（2003年10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